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stone carving in Putuo Mountain

浅谈普陀山多宝塔石刻的艺术特征

盐城市书画院二级美术师 | 夏一栋

中图分类号: J205 文献标识码: A

普陀山多宝塔位于普济寺东南方,又名太子塔,始建于元代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

孚中怀信禅师为普济寺(时称宝陀观音寺)住持时,曾去江南一带托钵募化,得到庐州宣让王的礼遇,宣让王帖木尔不花捐银千锭,用太湖石造三层佛塔,孚中怀信禅师以船载回普陀山,于普济寺旁再造两层台基,建成多宝塔,耸立于山门之侧名取《法华经》中“多宝佛塔”之意。据《元史》载:帖木儿不花(1286—1368),为元世祖之孙、镇南王脱欢的第四子,民间传为太子,所以多宝塔又称“太子塔”。多宝塔在历史上几经兴废,又屡经修复,现为普陀山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普陀山三大镇山之宝之一。

多宝塔为五层方塔,高约18米,占地12平方米。其中下二层为塔座,由条石垒积而成;上三层为塔身,有台无檐,全由太湖石砌筑雕镂而成。每一层四周均有石栏围绕。塔座栏外四面雕有32个螭首,均作吐水之状。一层石栏杆外有浮雕像24个,石栏杆上雕有小石狮子20头。三层塔身四面均凿有佛龛,各雕刻有古佛一尊,共12尊佛像。塔基一层四角有四大天王像,塔身第一层四周有十八罗汉像。由于这些雕像大都破损,因此笔者综合根据遗迹、历史图片和同类造像,来探析其独特的艺术特征。

多元的文化艺术特征

多宝塔的建造年代为元朝中后期,元朝自建立始便十分崇尚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全国的佛教事务。因此,随着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布,带有梵式特点的藏传佛教建筑形式也流行开来。从多宝塔塔身残存的佛像来看,上有头冠、飘带等装饰,以及疑似法器物件,塔身外檐四周刻有“六字大明咒”的藏文,这些元素都体现了梵式造像的特点,与汉地传统佛教造像有着明显的区别。汉地传统的佛教造像从唐代以后基本定形,一般是螺发肉髻,除了背光、衣着外少有繁复的装饰,程式化明显,可谓“千佛一面”,一般只能从手印上来识别不同的佛。因此,从佛像的繁复装饰上基本可以认定此为一座藏传梵式佛塔。

藏传佛教是在印度密教输入的情况下形成的,其造像艺术也带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点,造像一般丰肩、细腰、肥臀,且手印复杂,头冠、飘带以及各种法器装饰繁杂。这些特点在元初汉地的藏传佛教造像中较为明显,如杭州飞来峰的藏传佛教造像等。多宝塔虽然是一座藏传佛塔,但与典型的藏传梵式佛塔又有很大

差别。从塔身来看,藏地佛塔多为“瓶式塔”。瓶式塔由方形塔基、圆形塔身和塔刹三部分构成,而多宝塔的塔身为方形,异于典型藏地的圆瓶形,很可能是把汉地传统亭台楼阁的建筑形式融入其中;从造像来看,虽然多宝塔的佛像多有头冠、飘带、法器等等装饰,但丰肩、细腰、肥臀的梵式特征已不明显,为汉地中正平和的儒家文化所模糊,面容仁厚慈祥、丰润婉丽,更符合汉地传统的审美意识。

元朝幅员辽阔,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相交流实为常态,特别是到了元朝中后期,藏文化、西夏文化、蒙文化和汉文化在互相交流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多宝塔正是这一多元文化趋于融合的具体体现,它在建筑形式、造像风格,乃至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更贴近汉地传统的宗教意识和审美理念。因此,多宝塔正是元代中晚期多元文化艺术相互激荡,并趋于融合的产物。

工艺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审美特性

在《普陀洛迦新志》卷六(《大正藏》第9册)的孚中禅师条目下清楚地记载了多宝塔的建造因缘:“姑苏产奇石,信购善工,造多宝佛塔上三层(即太子塔),载归普陀,俾信心者礼焉。”从现在塔身的建造材料看,所谓“姑苏奇石”当为太湖石,佛塔上三层即塔身部分皆为太湖石所建造,并雇用当地工匠进行加工雕刻,造好后由船运回普陀山组装安置。太湖石属于石灰岩,容易受到外来自然力量如水、土壤的侵蚀而风化,经过漫长岁月大自然的精雕细琢,坚硬的部分得以留存下来,逐渐形成了形状各异、姿态万千、通灵剔透、曲折圆润的形态。所以太湖石又称窟窿石、假山石,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传统供石之一,其以造型取胜,多作为修造园林之用,呈现玲珑剔透、重峦叠嶂之姿态,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和喜爱。

孚中怀信禅师选用太湖石作为修造佛塔的石料可谓慧眼独具,在佛塔的建造中也甚为稀有,并且聘用了姑苏当地一流的工匠对这些太湖石加以雕刻成形,其独特的原始风格表现了佛菩萨深居洞窟海岛的幽远意境。可以说,其建造雕刻工艺水平达到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最高水平。而且,从多宝塔塔身的由往常圆形的“瓶式”转变为方形的“亭台楼阁式”,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猜想——造塔的能工巧匠把苏州园林的一些建造雕刻技艺融入到佛塔的建造中。但不论是否我们所猜想的,多宝塔的建造雕刻显然也不是对藏式佛塔进行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在尊崇原有藏塔工艺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汉地的文化元素,具有极高的艺术创造性。



修复后的元代净瓶观音像



双龙戏珠栏板

工艺性在传统佛塔建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多宝塔残存保留下来的原始石刻构件上，作为工艺性的物化结晶无不体现出刻工的匠心独运。如：塔身第一层基座中部的涡卷云纹，上部为山纹，层层叠叠，线条丰满圆润；塔身有许多圆形孔穴的太湖石，凹凸不平，罕见稀有，工匠于此巧妙地运用了太湖石的天然特点；塔身四角的圆形柱上刻有蟠龙，须爪鳞鳍，盘曲环绕，刻工精当；第二层的佛龕造型有莲瓣形和火焰形两种，皆刻工精细，线条流畅；第三层四角有马耳状的凸起，微微弯曲，每面均刻有种种山花蕉叶的饰纹，线条饱满，气韵生动……

历史上，元代藏传佛教佛塔的造像样式继承了梵式佛塔的一些特点，同时又融入自身的一些特色，在汉地又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更为注重写实，人物比例匀称、动态优雅，佛像的脸形也逐渐变得丰满起来，而多宝塔的造像样式也有这样的特点。从多宝塔的人物造像来看，服饰厚重、华丽，衣纹变化也较为丰富，形成了端庄优雅、秀丽柔美的造型特点。

多宝塔的佛菩萨雕像虽然曾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后来者从残存的遗迹来看，不仅仍然能清楚感受到初建时高超的工艺水平，更能获悉多宝塔的佛菩萨雕像对细节刻画的注重，其制作精巧，造型优美，可谓达到了工艺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佛教雕像普遍的审美需求。

神圣化与人格化的完美结合

多宝塔的建造虽然是在藏式佛塔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然保留了藏式佛塔的风格特点。多宝塔通过外在形状的变化来象征藏传佛教所宣扬的欲界和色界、无色界，分别对应于佛塔的塔基、塔身和塔刹，从下向上逐步收窄，呈金字塔形，体现了佛教的宇宙观，也突出了神圣的象征意味。

按照藏传佛教教义，可以推定多宝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遭受破坏的12尊佛像的名称，其中塔身的第一层是东为普贤、南为文殊、西为弥勒、北为观音^[1]；第二层是东为宝幢佛、南为开敷华王佛、西为无量寿佛、北为天鼓音佛；第三层是东为阿闍

佛、南为宝生佛、西为弥陀佛、北为不空成就佛。[2]根据残存的雕像判断，每尊佛像、菩萨像的姿势、朝向均与藏密曼陀罗中所标示的位置一致。

由此可见，多宝塔仍然是严格按照佛教造像规制来建造的，且有着细致的划分，在空间布局上突出了佛像的神圣地位，使伟大与崇高的神圣气质得以完整的体现，让人不由产生敬畏之情。当然，严格遵循教义和造像规制，不免导致雕像创作的固定化、程式化，但尽管如此，多宝塔的雕像仍然具有鲜明的人格化倾向，达到了神圣化与人格化的统一，两者皆有充分的表现。

多宝塔虽然仅仅是一座石塔，但其雕像的种类极为丰富，如各方世界的佛陀、菩萨、罗汉、护法天王、供养人等。多宝塔的佛、菩萨造型的创作手法比较拘谨和程式化，其着力表现出一种威严的神态，面部特征安静、祥和、肃穆而悲悯，旨在传达出佛与菩萨用慈悲情怀普度众生之意。而护法天王、罗汉、供养人造像的创作手法则比较灵活多样，或浪漫夸张、或传统逼真，如供养人的浮雕大多依据真人面貌特征雕刻而成，五官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而真实。值得注意的是，护法天王、罗汉的造像于此虽有人格化的特征，但又具有不同于现实人的神圣气质。

纵观多宝塔各类造像的造型特点，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为了表现宗教信仰的超越性，多宝塔的雕像传递出一种神圣的表达，让信众产生敬信；另一方面，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这些造像又有世俗化的倾向，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让信众产生亲和力。概而言之，超越性的神圣化表达与世俗性的人格化表现，构成了多宝塔主要的审美意涵。

参考文献

- [1] 有学者认为观音菩萨位于东侧或南侧。参见路秉杰、杨宇岍. 普陀山多宝塔修缮研究[J]. 古建园林技术, 2006(3).
- [2] 陈舟跃. 普陀山多宝塔[J]. 四川文物, 2007(6).